

李经纬先生对医史文献人才培养的贡献

岗卫娟

医史文献学科虽是一个古老的学科,但专业研究队伍至今仍较弱小,而且研究经费不足,安贫乐道的优秀研究人员缺乏,严重影响了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因此,精心培养青年学者,成为医史文献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

1. 充分认识培养医史文献人才的重要性

1919 年,陈邦贤先生的《中国医学史》作为第一部中国医学通史著作问世;20 世纪 30 年代,第一个医学史研究的学术团体中华医学会医史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医史学科发展的里程碑。1934 年,陈邦贤受聘出任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医史、疾病史教授,1946 年,李涛教授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设立医史学科,从此中国有了专门的医学史教研机构;1956 年,新创办的中医院校将医学史列为必修课,并相继设立医史教研室。为满足医学史教研工作对专门人才的需求,教育部委托中医研究院为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培养医学史教师。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我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医史学科也不例外。1972 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恢复科研工作,李经纬被任命为主任。1977 年国家制定的《1978—1985 年全国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医史文献被列为全国医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规划 54 项中的第 13 项,包括 10 类主要内容,计有:①中国古代医学发展史;②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③少数民族医学史;④中国医学专科史;⑤中外医学交流史;⑥辑佚和出土医书的整理注释;⑦中医学全书·十部医经类编;⑧古医籍释译;⑨疾病和专题文献研究;⑩中医辞典等工具书。上述 10 类内容几乎涉及医史文献学科研究的各方面,提出学科发展的重点方向。1978 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复会、《中华医史杂志》复刊,为医史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平台。同时,

英国学者李约瑟、美国学者席文、日本学者矢数道明等越来越多国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医学史研究与发展。

高等医药院校医学史课程的开设,医史文献科研规划的制定,国家科研任务的下达,医学学分会复会和《中华医史杂志》复刊,医学史研究的国际交流等,亟需大批医史文献专门人才。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本来就人数不足的医学史研究队伍却进一步削弱,医史文献学科发展需要与专门人才缺乏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面临这种矛盾,李经纬(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主任及后来升格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所长,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卫生事业管理与医学史专业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中华医史杂志》主要负责人)深感责任重大,他充分认识到,要想顺利完成科研和教学任务,促进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必须千方百计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培养专门人才。他虚心向同道请益,为医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

2. 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培养大批青年人才

在担任医史研究室主任及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时,李经纬重视人才培养,通过各种方式为医史文献研究室、研究所调回科研骨干多人,培养科研人员 20 余名、科辅人员 10 余名、研究生 30 余人,接待国内外进修及访问学者 10 余人次,为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发展繁荣及其后成为全国医史文献研究中心及教育基地奠定人才基础。

2.1 重视青年学者素质教育

20 世纪 70 年代,医史文献研究室恢复研究工作时,只有 3 位专家,一无助手,二无科辅人员,根本无法全面开展科研工作。作为研究室主任,李经纬多次向院领导申请要求配给大学毕业生,院里最终分给从中医院校、西医院校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8 名工农兵大学生。为了将他们培养成为医史文献专家,李经纬费了大量心血,想尽各种方法,如让他们

在科研工作中跟师学习,根据不同的专业需要,派出去专门进修,邀请院内外专家进行学术讲座,举办医史文献班进行定向培养等,经过他们的刻苦学习与钻研,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学者与专家。

在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建立初期,李经纬特别重视中青年的素质教育。在普遍进行专业教育的基础上,先后组织未系统学习中医的研究实习员脱产学习中医;为了适应日益增加的国际交流,组织有较好外文基础的助理研究员脱产学习外语半年到 2 年,进修学习后,基本上都能达到口译的水平。对于科研辅助人员,他也不放松,当时的科研辅助人员多为中学文化水平,为提高他们的素质,鼓励他们通过自学或函授等方式取得大专学历。鼓励他们在帮助老师收集资料的学习中不断提高,对参加图书资料管理与建设的青年,强调在老师指导下,做好本身工作的同时,必须跟师学好图书资料征集、编目、分类等,掌握目录学知识,甚至古籍版本鉴定知识,参加医史文献论文索引的编纂等。

为能扩大中医学史研究的影响并与国际接轨,李经纬还适时派中青年学者参加国际交流活动,开阔他们的视野,使其了解国际相关研究动态。1985 年,派傅芳访日,参加第 10 届国际东西方比较医史学术讨论会,推荐胡乃长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学术会议;1986 年,推荐郑金生参加在联邦德国召开的国际亚洲传统医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等。这为日后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开展国际交流及了解国际学术研究动态奠定了基础。

此外,李经纬先后多次接受国外科学史、医学史博士生来研究所进行资料收集、学术研究、调研、论文撰写,邀请和接待了多位国外(日本、美国、德国)科学史、医学史专家来所考察、交流和研究工作,以增加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扩展本所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学子的学术眼界,提高他们学术思维方法与鉴赏能力,加快了本所人才的培养与提高。

2.2 在科研实践中培养人才

李经纬对于参加科研课题研究可以提高科研能力有深切体会。早在 1958 年,李经纬刚从西学中班结业到医史研究室工作,时任主任的陈邦贤就带领李经纬参加《中国医学史简编》修订编写课题。作为一名医史研究的新手,李经纬虽缺乏经验,但在研究过程中得到锻炼,学到了前辈专家的学识、经验,逐渐掌握了医学史课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开始独立进行较小的课题研究,从而为其后医史研究奠

定了基础。所以,李经纬在其主持医史文献研究工作时,十分重视让青年学者参加课题研究,让他们在科研实践中得到锻炼。

1987 年应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之邀,李经纬主持编撰《中国古代医学史略》,作为《古代科学史略》丛书之一。李经纬组织毕业留所工作的硕士傅芳、胡乃长、马伯英,以及在读硕士研究生王振瑞、张瑞贤、廖果、王珣等参与课题,指导他们进行资料收集、整理、编写初稿,后经李经纬删节、补充、修定成书,于 1990 年由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影响较大。

在大、中、小型中医辞典及《中国医学通史》编撰等大课题研究中,李经纬坚持老、中、青三结合,强调各单位选派中青年参加课题,鼓励以老专家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后学。经过大课题的锻炼,使得这些青年学者认识到中医学的博大精深,树立了严肃、严谨、严格的“三严”治学精神,熟悉了科研程序、方法不仅为他们日后独立开展课题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激发了他们对中医的热爱,还为全国培养了一批中医辞书编纂学者与中医史学人才。

2.3 大力培养研究生

除注重对青年学者的培养外,李经纬十分重视培养医学史的专业人才,亦即对中国医学史专业研究生的培养。1978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他首次在全国招收医学史硕士研究生。当年报考医学史专业的考生有 28 名,成绩均很优秀,原定 3 名的招生计划,最后扩招录取 5 名,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批医学史硕士生,至今回想起来,李经纬仍为那些未能录取的 23 名同学感到惋惜!李经纬对研究生的培养坚持科学史研究基本功的训练,强调实地考察调研,他还曾带学生到孙思邈故里陕西耀县进行实地考察,并要求他们撰写调研报告和学术论文。对他们的学位论文选题,李经纬坚持以学生志趣、原有基础与学科发展需要为依据,强调自主学习与研究,以培养国家有用人才。李经纬这种与个人学习经历背景和爱好相结合的培养方式,既调动了研究生的积极能动性,又引导学生填补了医学史研究的空白点,先后培养硕士生 14 名,提高了研究水平和知识储备。

1987 年李经纬被确认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同年招收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医学史博士研究生。1993 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招收港、台与国外博士研究生。到 21 世纪初,培养国内外医学史学博士 16 名

(其中新加坡 2 名、日本 1 名、韩国 1 名、台湾地区 2 名)。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在坚持上述方针的同时,强调了疾病史与专科史专题研究,如张志斌博士论文《中医妇产科疾病史研究》即是她妇科工作经历与疾病史研究的结合,杨金生博士论文《中医中风病病史研究》也是其学术志向与疾病史研究结合的结果,这些博士论文不仅学术水平明显提高,也促进了医史学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大,社会效益显著。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李经纬还培养了王振瑞等博士后,扩展了医史学的研究领域。

李经纬培养的这些学生遍布海内外,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国医史学和中国医学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多数已经成为中国医学史专业的骨干力量,老师的教诲使他们终身受益。在李经纬的悉心培养下,他的研究生中间有不少成为当今医史学研究的中坚力量,活跃在医史学界,如傅芳、马伯英、郑金生、张志斌、朱建平、王振瑞、张瑞贤、廖果、梁峻、杨金生等,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勤奋的工作着,为中国医史学研究谱写着新的篇章。

3. 举办进修班为全国医史文献学科培养人才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先后举办多次全国医史文献专业学术进修学习班,每班 40~50 人不等。对于这些班的教学,除本所医史文献专家进行系统的学术讲座外,还特聘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各学科史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并聘请国外研究中国科学史、医学史的专家作学术报告。除理论传授外,还组织学员分组赴药王山、医圣祠、李时珍纪念馆、扁鹊庙、华祖庵等地区进行实地考察,指导学员撰写毕业论文,集中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学员们很满意,收获很大。由于成绩突出,颇受各医学院校、中医研究院所欢迎。因此,卫生部曾确定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为全国医史学与文献学教育基地,从而先后为全国培养了百余名医史文献专业人才。目前,他们多是各单位一线或退居二线专家,如陕西中医药研究院文献医史研究所苏礼、郑怀林,广州中医药大学赖文,北京中医药大学严季澜等,在他们的辛勤努力和全力带动下,全国医史、文献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现了大好局面,许多佳作出版问世丰富了医史文献学科的学术成果。

4. 发现人才,重点培养

李经纬从事医学史研究 50 多年来,开拓诸多医

史研究领域,在学界享有盛名,且对人和蔼,许多素不相识的中外青年学者慕名拜访或索序于他。对于这些青年学者,李经纬多是给予鼓励,根据各自喜好给予适当的建议,为他们解疑释难,指出他们成长的方向和进步的方法、途径等,使青年学者收获良多。长期以来,李经纬与他们一直保持着朋友般的密切交往。如:1981 年,在中医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的王米渠,将自己所写关于中医心理学的论文及收集的相关资料带给李经纬,请他提出指导意见并给予推荐发表于《中华医史杂志》。当时,李经纬尚不知他与本校指导老师观点相左(儿科临床老师批评他不务正业),阅后鼓励他说:“你的工作是一项创造性发掘,很有科学价值,你的论文我愿意推荐。若就所收集资料作系统整理,并进一步充实提高,将可完成《中医心理学》、《中医心理疗法》的巨著,它有益于子孙后代。搞好了,今后中医学院都会开这门课。”后来,王米渠不仅发表了《中国古代医学心理学史刍议》论文,更创立了中医心理学学科,撰写了《中医心理治疗》、《内经心理学集注》等中医心理学专著。没想到李经纬当时的一席话竟然成了王米渠开创中医心理学的动力。

为了使得自己的著作更有水平,或者有更多读者,抑或为自己增加些底气,青年学者书写通常都请名人作序。虽然李经纬工作繁忙,有学者请他写序,他从不推托。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他为别人写序、跋及书评 50 余篇,涉及针灸史、骨科史、瘟疫史、地方医学史、医籍录、民族医学、医家录等诸多方面。李经纬学识渊博,但在他为别人所写“序”中,总能发现青年学者的闪光点,并给以鼓励,寄以希望。如他在为贾维诚《三百种医籍录》序中写道:“本书辑录的三百种……编辑方法与一般书目不同,是以内容提要为重点,根据各医籍情况,首先或详或简介绍全书具体内容,并注意提示学术特点……是一本具有学术水平的工具书。……编者尚有在本书基础上编辑千种医籍著录的愿望,这种不倦的工作态度,严格的治学精神,值得学习。”序文不仅指出该书的优点,而且对于作者继续于此项工作的愿望表示支持,给予信心,寄以希望,必有助于作者扩展视野。

即使对尚在校园的大学生,对医史研究产生兴趣者,哪怕是小小文章、凡言之有理者,李经纬都尽心指导并千方百计支持他们参加医史学术会议或在杂志发表,以巩固他们难得的志趣,如后来成为李老

对于来自农村基层的中医师,他也不厌其烦地给予指导,帮助他们成才。例如:河北馆陶农村中医韩振廷医师,原为部队卫生员,复员后学习中医,勤奋好学,于 1991 年以医学起源为题,投稿中华医学会国际医史第 1 届学术会议,李经纬看该文后深为其精神所感动,出于关心选作会议论文并在会上与他深入交换学术,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在其后 20 多年的交流中,李老师得知他善治中风,遂建议他全面系统地学习历代名医对中风的认识、医疗经验等,以提高自己的学识和临床医疗水平,并鼓励他撰写中风专著。韩振廷听取李老师的建议,不仅临床治疗水平显著提高,还结合自身经验编撰完成《中风病辨证论治》,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近期正在准备修订再版。韩医师已成为农村中医的佼佼者,先后被山东、北京一些医疗单位特聘为专家。最近,李老师又对他完成的一篇学术论文进行指导,并建议发表以丰富疾病史研究。数十年来,李经纬在全国各地交了不少在基层工作的医药卫生界、文化界朋友,与他们交流学术,互相鼓励,共同进步。

5. 关注民族医学史人才成长

在医学史研究过程中,李经纬深知少数民族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 1978 年,他就提出要重视少数民族医药研究,加强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并于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创办少数民族医史研究室、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创立民族医史学组、《中华医史杂志》开辟专栏、积极倡导于《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设藏、蒙、维、朝民族医学卷。在他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4 卷)中,增加少数民族医学史内容。与此同时,他十分重视发现与培养各民族学者,鼓励他们开展本民族医学史研究。因此,少数民族医学研究者向他请教或索序时,他均给予格外关注。

1987 年,在为中华医学会医史学分会第 7 次学术大会论文审查时,李经纬读到《凉山彝医发展概况初探》一文,他深感少数民族医史研究之艰难,该文水平虽然并不很高,但确是医史学研究之亟需,特向大会予以推荐。在大会召开时,李经纬见到论文作者阿子阿越,与之探讨彝族医药研究情况,并鼓励她继续努力,发掘整理研究彝医史。1990 年,阿子阿越撰写《彝族医药》一书,特寄给李经纬审阅并请为之写序,李经纬欣然同意,并建议她开展深入研究。

1994 年,李经纬应邀参加第 3 届全国民族医药民间医药学术交流会,在会上他认识了西昌市中医院院长仁青卓玛医师,得知她兼有藏医药及中医药知识后,李经纬非常兴奋。李经纬深知兼有藏医及中医知识的人才奇缺,认为仁青卓玛当能为藏医药发展做出贡献。当仁青卓玛将所著家传《藏医秘方选》呈请李老审阅、征求意见并请为之写序时,李经纬欣然应允并推荐该书尽快出版。

一位 20 世纪 40 年代在雍和宫蒙藏医疗诊所工作的李永年先生,后以专长藏语调至西藏广播电台工作。年老退休后居山西省代县,专心藏医史研究与《四部医典》汉译工作。李经纬得知后,求贤若渴,特聘他为研究所特邀编译员,给予生活补贴,为他创造工作条件,帮助他完成中国第 1 部汉译《四部医典》。为了保证其翻译水平,特于拉萨召开了有藏、蒙、汉学者 10 多位专家参加的审稿会议,使该译作得以正式出版,后获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通过这次审稿会议,李经纬结识了更多的民族医学专家,希望他们深入开展本民族医史学研究。

在编撰《中国医学通史》时,李经纬深感有关少数民族和港、台地区的医史研究几乎空白。因此,他对此领域格外关注,还专门邀请相关专家参与。其中,他特别邀请香港医学史专家谢永光参加。此前,李经纬曾读谢先生香港抗日史论文多篇,对其医史研究功力颇为赞赏,当喜闻谢先生编撰《香港中医史》时,欣然同意为其作序,赞其“必能为现代和未来留下宝贵的史论与明鉴,成为中华民族给人类提供更加有益的历史经验的佳作。”

李经纬得知台湾学者——中国医药大学哈鸿潜教授曾研究过针灸铜人后,特邀请他参加编撰《中国医学通史·台湾医学史》(包括台湾原住民医史)。哈教授与助手高田,经过深入调研、查阅档案,出色完成 10 多篇论文,先后在《中华医史杂志》发表,并按照《中国医学通史》体例要求撰写完成相关章节。1993 年,李经纬访台时与林昭庚相识,得知其在针灸医疗及针灸典籍方面颇多研究,后来经常与他进行学术交流。李经纬先后为林昭庚《针灸英杰——林昭庚博士》及其著作《针灸医学史》和《新编彩图针灸学》写序,赞赏其“精古文献,学兼中西,以今发古,善阐创新”。

(收稿日期:2011-11-15)

(本文责任编辑 王振瑞)